守住乡土根脉 激活内生动力

——2026年度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与乡村振兴学术研讨会综述

本报记者 冯朝晖

10月21日至22日，来自中国文物学会古村镇专业委员会的专家学者相聚长江之滨、三峡腹地重庆市云阳县，参加2026年度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与乡村振兴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聚焦保护利用理念、活化振兴实践，为留住传统村落根脉烟火，激活其生机活力，实现可持续发展贡献学术智慧。



黎明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彭氏宗祠



在云安古镇文峰塔前，与会代表听取云安盐业遗址考古最新进展

理念探讨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顾玉才从学理层面阐释了传统村落的特点及其保护利用的新理念、新做法。他提出，传统村落不同于文物保护单位和古建筑，传统村落中的乡土建筑是活着的遗产。我国对传统村落的保护经历了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开辟为生态博物馆、公布为历史文化名村或传统村落几个阶段。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落的保护要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重视村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充分尊重村民意愿，保障村民的参与权、决策权，构建以政府主导，企业、文化专家、村委会、村民、新乡贤等多元主体参与的保护利用机制。他特别提到了2025年1月在日本通过的《关于遗产生态系统的群马宣言》。宣言倡导的整体化遗产观、重视社区与原住民、拓展遗产的真实性内涵、面向可持续未来等内容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有诸多启示。

中国文物学会原副会长郑国珍，对福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两种典型路径进行了对比研究。永泰嵩口镇是原住民存续的商贸古镇，村庄生态完整。其保护理念是进行针灸式微改造、最小干预、不整体搬迁原住民，优先保护原生商贸民俗与庄寨文化；保护困境是古镇风貌老化、基础设施落后，现代化生活需求与古建保护存在冲突，面临商业开发与原住民外迁风险。屏南龙潭村是人口流失的空心古村，大量古厝闲置坍塌，原有社区活力基本流失。其保护理念是先引人才，再修老屋，以艺术乡建为抓手，创新老屋认祖机制，吸引新村民入住，构建新老村民共生社区；保护困境是老宅闲置破败、修缮资金匮乏、人口流失严重，村集体缺乏产业与人才，村庄失去内生发展动力。嵩口重在守护存量社区，防“退化”，龙潭重在重建空心社区，促“再生”，但无论借鉴哪种模式，都必须摒弃大拆大建、重视村民主体、因地制宜为先。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侯实，基于复旦团队多年来在西南地区的调研成果，阐释了乡村遗产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他认为，乡村遗产是自然与文化、物质与非物质、可移动与不可移动等要素的集合，兼具历史变化与现实状态的双重维度。乡村中的山地、水源、森林、土地、村寨及动植物资源；村落内部及周边的建筑、道路、树木、防御设施、水利设施、生产工具、生产空间等物质遗存；生产技能、时令节气、建造技艺、生活习俗、信仰与仪式等非物质遗存应被视为有机整体，通过研究其内在关联揭示乡村遗产价值。要将血缘、业缘、地缘等方面具有关联性的乡村遗产作为整体，通过全面调查揭示更大地域范围内乡村遗产的特征与演变规律，揭示其在生存智慧、生产知识、生活美学、生命哲理等方面的价值。

中国文物学会古村镇专委会常务委员杜晓东，从新质生产力视角探讨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他认为，历史文化资源必须经过消化吸收，才能转化为经济收益、社会凝聚力、村落活力。只有让村民理解本土历史，把文化要素融入村落更新、产业营造，历史文化才能真正赋能乡村发展。以新质生产力激活传统村落，实现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的跃升，是传统村落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

案例分享

中国文物学会盐业文物专委会副主任委员蒋铭，分享了卓筒井保护利用经验。四川遂宁市大英县卓筒井镇拥有245眼古盐井，为研究宋代卓筒井钻井技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2017年古村镇专委会在大英县召开古村落保护研讨会后，大英县政府在盐业遗址普查、文物本体修缮、保护规划编制、学术研究、文旅融合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如今宋井桃源景区、卓筒井遗址公园、特色研学等项目成效突显。

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处长张云鹏分享了黑龙江传统村落的保护实践，提出了未来的工作方向：一是完善保障体系。压实主体责任，健全省市县三级联动，壮大乡土文物保护队伍；二是深耕考古阐释。推进“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开展黑龙江文明探源，加快考古成果转化；三是创新融合发展。发挥“文物+”效益，打造小型展示点、研学微场景，赋能乡村振兴。

中国文物学会古村镇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熊建华，从中国乡土石刻文献入手研究传统村落。他认为，乡土石刻文献不仅记住了乡愁，也刻下了两千多年中华农耕文明、乡村社会的文化经络，是东方农耕文明最后的清晰背影，也是认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一把小小钥匙。乡土石刻文献的研究对象为散落在古村镇的石碑以及具有乡土石刻文献特点的、收录在典籍中的石刻文字，包含楹联、摩崖石刻、墓志墓碑。刊刻内容涵盖族群关系、交通线路、军事要塞、乡风民俗、基层治理、钱粮土地、市场商贸等诸多信息。他呼吁政府主管部门、学术机构和社会公众共同推进乡土石刻文献的抢救保护。

福建省三明市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黄敏，以尤溪县桂峰村为例，提出了乡村遗产系统性保护的四个策略。一是构建教育与认同的双重体系，强化集体认同和文化凝聚力；二是做好时代语境下的内涵重塑与价值衍生；三是让民众参与社区发展，激活内生动力与共享机制；四是用科技赋能文化遗产创新与变革。她认为，有效的乡村遗产保护须建立在整体性价值认知之上，摒弃“见物不见人”的狭隘观念；成功的保护实践有赖于文化传承、空间治理、社区发展与技术创新的协同推进；社区内生动力是维系遗产活态性的根本，外部干预必须通过激发内部主体性才能持续有效。

重庆源道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总监罗斌，分享了云阳县黎明村的保护更新案例。通过构建县—镇—村—民—社会力量—设计师六维互动的协同治理体系，打造农文廉旅融合的家风教育基地，黎明村重焕生机。黎明村的保护见证了我国文物保护事业从抢救性保护到系统性保护，从单点保护到整体性保护，从保护为主到活化利用，从行政主导到多元参与的进程。所谓留住乡愁，不是把村庄封进琥珀，而是让土地继续当他的作者，继续编写四季的诗歌。

此外，贵州理工学院教授王东，展示了苗疆走廊沿线传统村落的地域文化特色。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后徐应锦，从文化景观保护角度切入，通过376处案例，构建起广东道观园林研究的历史样本。

云阳实践

云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邓科介绍了云阳县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的探索实践。云阳有2300多年建县史，4000多年制盐史，秦楚、井盐、巴蜀、红色等文化相融相生。近年来，云阳系统推进十大古宗祠、十大古建筑、十大古村落修复和十大价值研究，创成5个市级传统村落，组建全市首个巴盐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区县首个长江三峡文化遗产研究院。在古村落保护利用工作中，坚守“三条边界”：企业不能取代村集体、市场运营不能挤压村民发展空间、产业导入不能损害传统格局和文化遗产真实性；践行“四个不能等同于”：不能把“修好建筑”等同于“保护好村落”，不能把“项目建成”等同于“机制建成”，不能把“群众受益”等同于“群众参与”，不能把“引入业态”等同于“实现活化”，处理好保护与发展、政府与市场、村落保护与村民发展、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振兴相互成就。

研讨会期间，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黎明古村和云安古镇。黎明村是中国传统村落、重庆首批历史文化名村，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彭氏宗祠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彭氏民居群。几年前，这座藏在大山中的400多岁古村还鲜为人知，如今游客可在蜿蜒的乡村古道上漫步，欣赏雄浑厚重的古建筑，走进祠堂老院品读耕读传家、崇德向善的家训家风，下到田间地头体验农耕文化。

云安古镇是明清至民国各地盐商、灶户、盐工聚居区，核心街区在2008年三峡库区蓄水后沉入水下。古镇地面部分尚存浣溪古井、祖师庙、清代文峰塔、古道码头等遗迹，盐工俱乐部、盐厂厂房、职工宿舍楼等近现代建筑。目前这里的工业建筑已全部废弃，只有极少的老年人还在此居住。这座古镇属于停产、无原住民、水陆并存的工业遗址，后续的保护利用工作仍需多方出谋划策。

学术总结

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岳志勇在总结发言中交流了几点体会。一是要拓展传统村落概念，丰富其内涵，对接乡村遗产。二是要贯彻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理念，坚持最小干预原则，多维度挖掘传统村落价值，因地制宜提出保护利用方案和路径。三是要贯彻统筹发展、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发挥党委统揽全局，政府统筹、多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作用，同时坚持以人民为主体，坚持有机更新，重视人民群众、在地群众发展诉求。四是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利用。将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乡村振兴、文化传承和国家战略。通过保护赋能、科技赋能和产业赋能，推动传统村落创新性发展，成为新时代新质生产力。五是提炼成功案例的理念和做法，总结国内外的经验和教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之路。

中国文物学会古村镇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唐孝祥在最后的学术点评中提到，本次研讨会围绕协同保护与利用、价值导向与系统方法展开，涉及云阳峡江遗产、闽东商贸古镇、西南乡村遗产、乡土石刻文献、新质生产力与传统村落发展、传统村落系统性保护等案例，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提升了学科话语权。古村镇专委会每年举办一次学术研讨会，学术质量逐年提升，研讨主题持续跟踪政策导向，将政策热点与学术研究深度融合，体现了专委会严谨扎实的学风。

中国南方传统建筑营造

——营造尺与占筮尺的共同影响

张昱涵 周学鹰

中国南方传统建筑尺寸，并非只由一种尺制所决定。通常，工匠们同时采用两类尺：其一是用于实际测量的营造尺；其二是用以判断吉凶的占筮尺。首先，用营造尺完成测量、放样和构件加工；其次，以占筮尺检验并微调部位尺寸，使建筑构件在满足结构、使用需求的同时也符合传统的择吉观念；最后，再以综合权衡后的尺度，作为加工建筑构件采用的数值，最终建造房屋。因此，两种用尺角色不同，却共同影响着建筑的最终尺寸。这种技术用尺与文化用尺并用的现象，在南方传统建筑中尤为明显。当前，已有研究往往对营造尺与占筮尺分别考察，较少将两者一起讨论。实际上，在我国南方，营造尺与占筮尺分别承担着建造度量与择吉的功能。

度量工具：营造尺确定尺寸

营造尺是用于建筑营造的基准尺长，即一尺的绝对长度，不仅是实物概念，更是决定建筑各部位实际尺寸的数值概念；作为度量工具，它是建筑营造的基础，决定建筑的整体尺寸。其主要用于建筑测量、放样及构件加工等技术层面，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应用。

一般按照使用对象及范围，营造尺分为官尺与乡尺。官尺是经历代政府正式颁发与施行的官方尺长，为历代的法定尺。乡尺则是民间某一地域范围或者人群内通行的标准尺；南宋以后，在一定的地域长期存在并一直延续至今。有研究者把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具有共同或接近的基准长度与历史属性的乡尺集群称为“尺系”；与北方多用官尺不同，南方地区营造尺流派较多，形成了较复杂的地方尺系。政权分立、信息传达不便、行业流派传承等因素，使乡尺具有滞后性与多样性。南方地区的营造尺通常即乡尺。

营造尺的使用常采用“整数制”与“对分制”的原则。即以整尺、整寸为基本单位，即使非整数，也会采用“四分之一寸”“二分之一寸”“四分之三寸”等刻度，以满足建筑营造的精度要求。如此，既保证施工的便利性，也体现了建筑营造中对尺度的灵活把握。

择吉工具：占筮尺推定择吉

占筮尺用以判断建筑尺寸（规模）的吉凶。古人认为建筑尺寸与居住者的福祸、财运、官运、子嗣等密切相关，在尺上写着有关吉凶的文字，故又被称为吉凶尺、风水尺。占筮尺主要流行于具有择吉传统的南方地区，用于建筑局部尺寸的吉凶判断，以满足传统营造观念中的择吉需求，蕴含着通行民间的传统文化观念。

工匠用营造尺确定建筑大体尺寸后，再用占筮尺选择与调整面阔、进深、举折、门窗、家具等详细尺寸。常见的占筮尺包括压白尺、门光尺、玄女尺、丁兰尺等，其中压白尺与门光尺的使用较广。

压白尺亦称飞白尺、紫白尺、木工尺、曲尺等，在营造建筑、制作器物时用来度量与掐定屋宇、庭院、门户尺寸的吉凶，在江南与东南沿海地区尤为常见，至今仍见于广东、福建、江浙等地区。其常为木工所用的L形尺（曲尺）形式，一般短边刻度为十寸，每寸又分为十分（图1）。压白尺与官尺通常按照一比一换算，使用较方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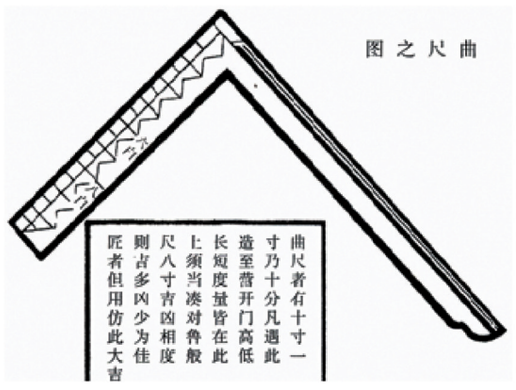


图1 压白尺示意图

图源：牛晓霆,郭伟.建筑风水与压白尺[J].家具,2009,(S1):76-78.

压白尺有“九进制”和“十进制”两种，以十进制较常见。其吉凶划分与洛书九宫、天文九星等有密切联系，尺面上可见一白、二黑、三碧、四绿、五黄、六白、七赤、八白、九紫、十白（图2）。择吉时，量尺从一白开始。三白，即“一白”“六白”“八白”为大吉；以“六白”最吉，“一白”次之，“八白”再次之；“九紫”为小吉。清代在此基础上，增加一小吉“四绿”。明清以降，压白尺的使用原则愈加复杂，并与八卦纳甲及房屋坐向等堪舆理论结合。各个地区还存在不同方法，包括压字法、留吉法、压倍法与联白法等，具有地域性与多样性。

门光尺又称八字尺、门公尺、鲁班真尺、鲁班尺，有的文献与民间匠师把曲尺与木工尺称为鲁班尺。门光尺用以量度选定门、窗、床、器物尺寸，主要用于建筑小木作层面。该尺分为八等分，依次标有“财、病、离、义、官、劫、害、吉”八字（图3）。其中“财”“义”“官”“吉”为吉字，“病”“劫”“害”等为凶字。不同建筑类型对吉字选择有所区别，如压“义”字用于祠宇、衙署；压“官”字用于衙署或寺庙；传统民居中最常用的是“吉”字等，目的都在于趋吉避凶。

由于匠师传承之间有差异，使用原则并非固定格式，故工匠的流派不同用尺的起点也不一样。如《鲁班营造正式》与《鲁班经》的吉门尺寸是从“财”字量起的，而《工程做法则例》则是从“吉”字量起，尺上的八字吉凶对称排列，即两端的两寸与中间的两寸为吉。所以，无论从“财”字或“吉”字起量，吉门恒为吉，凶门恒为凶。工匠将建筑尺寸换算至门光尺以对应刻度，判断尺寸是否符合择吉要求，并据此进行适当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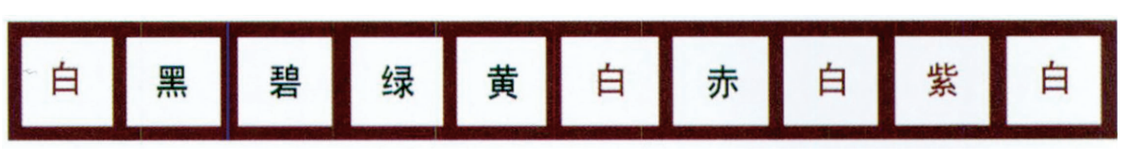


图2 压白尺十进制

图源：牛晓霆,郭伟.建筑风水与压白尺[J].家具,2009,(S1):76-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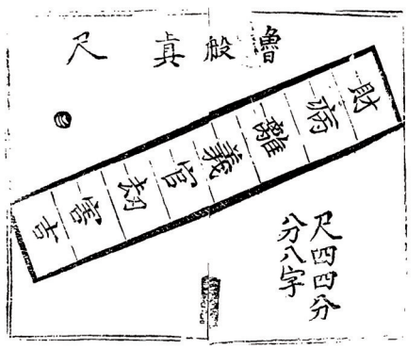


图3 八字尺示意图

图源：程建军.关于“门光尺”——答英国Mr.H·W·Tang[J].古建园林技术,1991,(01):16-21.

技术与文化用尺并行

数值上，营造尺与占筮尺之间存在固定的换算关系。压白尺的尺长一般就是营造尺的尺长。营造尺与门光尺的关系较特殊，《鲁班营造正式》与《鲁班经》载：“鲁班尺乃有曲尺一尺四寸四分；其尺间有八寸，一寸准曲尺一寸八分。”工匠使用占筮尺验证建筑尺寸吉凶时，必须将营造尺寸换算成对应的占筮尺寸，再判断是否合吉。

相对固定的换算关系，使两重尺制能够有效衔接。工匠先以营造尺确定合适的数值，以满足建筑环境、结构、人体工学等基础要求；再将该数值换算成对应的占筮尺，检验其所落字格；如有必要，便在不影响基本功能的范围内增减尺寸。这里的“微调”并不意味着随意改变建筑尺寸，而是以营造尺确定的基本数值为边界，在其允许范围内适当进行调整。

据此，在实际营造中，营造尺属于技术用尺，把握建筑整体及构件的基本尺寸；占筮尺则属于文化用尺，处理择吉需求，满足人们趋吉避凶的心理需求。先以营造尺确定面阔、进深、柱高、举折等大木作层面的尺寸，再以压白尺核验；门窗等小木作在满足使用条件后，要用门光尺核验。

两类占筮尺的侧重点不同。压白尺主要用于大木作层面尺寸吉凶判断，亦可用于小木作层面的尺寸；门光尺则更集中于门窗、家具等小木作尺寸。我国古代工匠在制作器物门窗定其尺寸吉凶时，以“门光尺”与“营造尺”并用。压白尺与门光尺均为“吉”最好，而当两者结果出现冲突时，压白尺存在一定的退让，以门光尺为准；压白尺为不吉而门光尺合吉亦可，可见其变通性。

例如，木工口诀：“街门二尺八，死活一齐搭”，其中二尺八（28寸）为营造尺寸，八寸合八白，从压白上来看合吉，转换为门光尺（1寸=1.8门光寸），合15.56门光寸，余7.56门光寸，无论从“财”或者“吉”量起均合吉。可见，建筑门窗尺寸除需要符合人体工学，吉凶角度也有一定的讲究，合吉才能正式采用。口诀之所以在行业流传，在于将施工经验与择吉规则压缩成便于记忆和执行的语言。

营造尺与占筮尺具有明确的分工与联系，在建筑营造过程中形成了“营造决定、占筮修正”的使用模式。营造尺决定建筑整体尺度，占筮尺则在此基础上对局部进行适当调整，使建筑兼顾技术上的合理性与文化上的美好寓意，营造尺与占筮尺共同影响建筑最终尺度，体现了技术与文化观念的统一。

双重用尺的应用与价值

当然，对建筑考古学科而言，营造尺是在对建筑遗址复原过程中确定建筑尺度的重要依据；建筑遗址往往只保存台基、柱础等基址信息。

研究者可根据考古遗迹，如柱础间距、开间距离等，反推出可能使用的营造尺长，并与已知所属朝代的尺长进行比对。李思洋在对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复原时，根据南回廊、西回廊、东回廊与1、2号遗址的中线间距的实测数据等，进行营造尺计算，并与既有唐代营造尺比对并计算两者的符合率，最终确定最合适的尺长进行建筑复原等，具有较好的逻辑性、科学性。

目前，此类方法已普遍适用于基于建筑遗址的复原，对现今流传的古代营造尺长或也有一定的验证甚或纠正作用。但是，对于南方传统建筑遗址的建筑考古学复原，不仅需要关注营造尺，还应结合占筮尺进行综合判断与尺寸调整等。这些对于我们理解古人文化观念、风水思想与趋吉避凶的心理诉求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以建筑遗址台基、开间实测数据为基础，推算传统营造尺长，在精确度与可靠性等方面虽可能存在某些难以避免的误差，但是针对破坏严重、遗迹信息较少的建筑遗址，应是有较强可行性的研究途径。以此方法得出的营造尺长，反映地域营造传统与技术、区域性尺系分布与演变，甚至可追踪工匠流动、技术传播及区域性建筑文化流变等，为建筑考古学的研究提供新视角。

结语

上文成果提示我们，至少对我国南方地区建筑遗址进行建筑复原时不宜只追求一个整齐的数值，还需要根据当地传统占筮尺进行微调。传统建筑的某些局部尺寸略偏整尺、整寸，可能是工匠在技术条件、使用需求与择吉观念之间做出的选择。建筑尺寸不再是单纯的数字，它一端联系着材料、结构与工艺，另一端连着地域习俗、行业传承与居住者的心理希冀等。

营造尺能够提供度量长度，作为技术依据掌握着建筑尺度大方向，解决建筑如何合理建造的问题；占筮尺能够判断吉凶，根据人们不同文化心理需求对尺度进行微调，回应的则是建筑如何被赋予吉祥寓意的问题。

因此，把营造尺与占筮尺放在同一框架中讨论，能使当今的建筑考古学及传统建筑史学研究等更接近实际建造过程，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建筑尺度形成过程，揭示传统建筑中技术与文化并存的营造特点，对我国建筑考古（史）学实践与理论研究等具有重要意义。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